

里一定传入了不少的唐朝风俗。再说佛教，在蒙藏固极盛，可是在汉人区域中也何尝不盛。班禅离了西藏之后，内地多少人去欢迎他，真个是肩摩毂击，户限为穿。藏人称汉人为“嘉那黑”，称寺院为“仓”，我到拉卜楞，看见一所大寺，他们称为嘉那黑仓，是汉人舍施资财建筑的。我到青海，听说十余年前，西宁道尹黎丹开办藏文研究社，招集青年攻读藏文，有一个师范学院的学生名叫刘登魁，他的藏文学得不差，适逢卻摩寺的活佛去世，他就入山当了继任的活佛。番人本无姓，我见过一个番女，她有机会听无线电，就从无线电上学得了汉语，又学会了汉歌，对人说“我愿意姓蒋”，因为她知道蒋委员长是现在中国最大的人物，她要自己选择的姓上表示她的高攀。可见汉人和藏人所以觉得隔膜，只为语言不通，彼此很少来往，倘能打通这一重难关，两方的情意自会立刻融合无间。不看回民吗，番地中的买卖十之八九是他们做的，回番两方各有各的坚信的宗教，似乎很不容易相处，可是回民学会番话，善做生意，久而久之，情谊也自然浹洽。所以在喇嘛寺院区里，县政府要造一所小学校还办不到，然而高大的清真寺却兴筑起来了。再看，寺院区里本来只许单身商人入境，现在也建立了一座一座的“塔洼”（村镇）了，一班商人扶老携幼，拖儿带女，住进这禁地来了。更看信仰回教的人，在中国境内似乎只有缠回和汉回两种，可是河州大东乡的蒙民虽依旧说蒙话，却全信了回教；青海辉南旗的蒙民也全信了回教。藏民信回教的如撒拉，在六百年前只有八个缠回进入番地，娶了番女成家，到现在已有数万人了，嫁给他们的番女都是回教徒了。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趁这机会一说。我若发问谁是汉文化的代表者，大家一定会想到孔子，那么孔子的后裔是汉文化集团中的分子，不再有什么疑问。可是我这回走到甘肃，听说永靖县的孔家都做了回回；走到青海，又听说贵德县的孔家都做了番子。难道是他们不肖，胆敢背弃了祖先的礼教？不，他们有适应环境的要求，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他们加入了回文化和藏文化的集团，正表示一个人不该死板地隶属于那一种文化集团，而应当随顺了内心的爱慕和外界的需要去选择一种最适当的文化生活着；而且各种文化也自有其相同的质素，不是绝对抵触的。从这种种例子看来，中华民族是浑然一体，既不能用种族来分，也不必用文化来分，都有极显著的事实足以证明。

有一种人小心过甚，以为国内各种各样的事情最好不谈，谈的结果适足以召分裂之祸。记得前数年就有人对我说：“边地人民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历史时还好驾驭；一让他们知道，那就管不住了。”但我觉得，这是讳疾忌医的态度，我们不当采取。要是讳疾忌医之后而疾病会好，那也值得，无如其病将日深何！试想那班眈眈逐逐的侵略先锋早在中国境内下了百余年的功夫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做的工作他们会做，我们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我们表示谨慎，闭口不谈，他们却会侃侃而谈，而且谈得涛张为幻。我去年游番地时，眼见许多黄发碧眼的人们在那边混着，他们已住了十余年二十余年了，说的番话纯熟得同番民一样，而且他们男的穿了没面羊皮的番装，女的头上梳了数十条小辫，表示其道地的番化。到了番地里，挨家送礼，表示其亲善。听说他们又替番民照相，检出鼻子高些的，眼睛深些的，便说：“你本是和我们同种，只因流落到中国来，才比我们差些了。”我又曾看见他们画的地图，把我们的行政区域改变了，他们要西藏地方扩张到怎样远，界线就画到那里去。这次我到云南来，又听说这些侵略的先锋为了当地的夷民笃信诸葛孔明，又在捏造故事来装点自己，说耶稣是哥哥，孔明是弟弟，他们是一母所生的同胞了。我们还不敢谈真的历史，他们却大谈其假的历史；我们只想平静无事，他们偏要兴风作浪。我们只知道日本人有特务机关，那知道别国的有实无名的特务机关也是星罗棋布。要想对付他们，唯有我们自己起来，向边地同胞讲实在的历史，讲彼此共同光荣的历史，讲全中国被敌人压迫的历史，讲敌人欺骗边民的历史，讲全民族团结御侮共同生存的历史。惟诚可以感人，边地同胞的性情是最真挚的，我不信他们听了不会感动。

知识青年是推动时代齿轮的人，国事到了这步田地，不知道有多少青年热血沸腾，欲报国而无所适从。我现在敢对他们说：我们所以要抗战为的是要建国，而团结国内各种各样，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实为建国的先决条件。你们应当不怕艰苦，学会了边地的言语和



生活方式，到边地去埋头服务，务使一方面杜绝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把野心家及其流毒一概肃清出去；一方面可以提高边地同胞的知识，发展他们的交通，改进他们的生产，传达内地的消息，搜集了他们的历史材料而放到全国公有的历史书里去，使得中原和边疆可以融为一体，使得将来的边疆只是一条国土的界线而不再是一片广大的土地。青年们应当和边民通婚，使得种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的淡下去而民族的意识一代比一代高起来；更吸收了各系的新血液，使后裔们的体格日趋健壮。能够这样，中华民国就是一个永远打不破的金瓯了！

为了篇幅的限制，即此煞住，让我们共同喊几句口号来结束这篇文章：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

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

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

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九日。昆明

【转 载】

“中华民族是一个”？

——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

《中国民族报》记者 赵志研

1939年2月9日，昆明《益世报》的《边疆周刊》发表了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由此，一场围绕中国是不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学术辩论在众多学者中展开。虽然此次辩论因战争及政治原因未能充分展开，但实际上起到了丰富中华民族含义的作用，使中华民族的主权意识、疆域意识、民族一体意识在争论中得到传播，并对日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诞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呼吁加强民族团结以抵抗日本侵略

抗战8年间，顾颉刚辗转于甘肃、青海、云南、四川等地。颠沛流离的生活，让顾颉刚对于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改变了他作为一名纯学者的理想和价值观。

在甘肃兰州，顾颉刚被兰州青年推选为“老百姓社”社长，编印通俗读物《老百姓旬刊》，随后他又来到甘南藏区，了解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的风俗、生计。1938年10月，顾颉刚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邀，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一职。

不久后的12月，《益世报》在昆明复刊，顾颉刚又受邀担任该报《边疆周刊》主编。在《边疆周刊》12月19日的发刊词中，顾颉刚明确指出，创办《边疆周刊》是“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时时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查，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

随后，顾颉刚又在《益世报》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的评论，评论指出，“‘中国本部’一词是日本侵略者‘为了中国，必先攫取满蒙’而硬造出来分化我们的名词”，“使得



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中国的根本”，“如此，中国人觉得尚可忍受，对外国人觉得尚可原谅，而日本人的阴谋就得逞了”。因此，顾颉刚提出，要“依据国家的实界和自然区域来分划我们的全境，而不该颠预糊涂，随便使用别人蒙混我们的名词，以致国家疆土尚未受帝国武力侵略的时候竟先在自己的观念里消失了。”

创办《边疆周刊》，倡导边疆史地研究，呼吁开发西部，呼吁加强民族团结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顾颉刚对边疆、民族问题的关注，并不单纯出于学术上的兴趣，更是倾注了政治上的考虑。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有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和优良传统，作为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顾颉刚用自己的行动将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融入现实生活中。

《边疆周刊》出了几期后，正居住于昆明的傅斯年致书顾颉刚，提醒顾颉刚要谨慎对待边疆问题。傅斯年在信中写道，“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其次即所谓‘民族’。”傅斯年提出，作为学者“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他又进一步阐述道，“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

顾颉刚、傅斯年早年曾是北大同窗好友，后因志趣迥然而分道扬镳。傅斯年也是著名学者，他从1928年起就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1937年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又参加国防参议会与国民参政会，与政治深切的关系导致了傅斯年在政治上的敏感性。顾颉刚接到傅斯年信后，出于民族大义，他抛弃了私人恩怨，并听从傅斯年的劝说，撰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

对于写作此文的动机，顾颉刚在1939年2月7日的日记中有着详细记载：“昨得孟真（傅斯年字孟真——编者注）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此后，顾颉刚又进一步阐明自己写作此文的动机，此前他在西北考察，“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觉得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据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决’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化文明的日期，岂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的罪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引发的辩论

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顾颉刚开宗明义道：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在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顾颉刚认为，现有的汉人文化“是和非汉的人共同使用的”，因此，“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他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现在民间的主要乐器是胡琴、琵琶和羌笛，这分明是从胡人和羌人那边接收过来的。再说，我们坐的是椅子，北方人睡的是炕，椅子原称胡床，也是从匈奴方面传进来的，炕则是辽金人带进来的。我们骑的是马，不消说得，自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始有单人匹马，以前都是用马拉车的。古人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无论男女裹着一条裙子就算了。没有穿裤子的，裤子之起也是为的骑马的方便，可见裤子即是胡服的一种。现在人家死了人，就向纸扎铺里定做许多纸制的房屋和用具，在空地上焚化给死者收用，然而我们知道从唐朝以前都是用实在的东西或泥制的东西埋葬在坟墓里，纸制明器乃是辽国的风俗传播进来的。我们现在穿的衣服，男人长袍马褂，女人旗袍，大家一定记得，这是满清的制度，而且旗袍还是清帝退位之后大家开始穿起来的。中国古代的女子装饰容貌只有涂一种膏，至于涂脂抹粉也是学的匈奴女子的风尚，所以匈奴人在失败之后会唱着‘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歌。像这一类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细细考究起来可以写成一部书。”

顾颉刚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而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因此，顾颉刚呼吁“凡是中国

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在析出什么民族”，“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应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称呼，而和那些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华民族是一个》在《边疆周刊》刊出后，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益世报》也收到不少讨论文章。当年发表在《边疆周刊》或《星期评论》的信件和文章有张维华的《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白寿彝的来函（后附顾颉刚的按语）、马毅的《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等。上述文章对顾颉刚的观点大多表示了赞同，特别是从当时的抗战形势着眼，大家认为顾颉刚提出这一观点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共御外侮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然而，民族问题毕竟不单单是政治问题，它还是个学术问题。费孝通、翦伯赞等学者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就提出了质疑。费孝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提到，中华民族应团结一体进行抗日，但是从民族研究学理角度也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应当受到尊重。抗日并不一定要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存在。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人群发生共同的利害，有对内稳定、对外安全的需要，自然有可能结成一个政治团体。因此，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翦伯赞认为，国家确实需要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统一，但“团结”不是“消灭”，“团结”不但不应否定其他民族之存在，并且应扶助他们的独立自由之发展。只有承认各民族之生存乃至独立与自由发展的权利，在民族与民族间建立经济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平等关系，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

针对费孝通的质疑，顾颉刚在《边疆周刊》连续发表两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不过，费孝通此后却没有再写论辩文章。对此，费孝通于1993年在参加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可作为解释。他回忆到：“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膺，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的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的观点。藉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

为了救亡图存而对中华民族形成的认同

在这场争论的背后，折射出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对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所经历的复杂历史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的侵略已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生存。正是在这一严峻的挑战之下，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普遍激发出来。最早具有较为明确的现代中国各民族一体观念，并且最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应该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但它在该文中所指的还是汉族之意。至1905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再次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就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此词的涵义，虽然他认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但他断言“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清朝末年，中国知识精英们关于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来自西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核心是国家由民族组成，也就是说，民族国家只能由单一民族组成。革命派知识分子痛恨民族压迫，为反满寻求各种依据。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传播，恰好为他们的革命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力主“排满建国”的革命派知识分子来说，所认同并欲建立的是单一的汉民族国家。

对于“中华民族”形成认同共识，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则在体制上确保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实现。孙中山起初也具有浓厚的排满革命的特

